

## 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

### 在中国经济学第 8 界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我很荣幸应邀在中国经济学第 8 界年会闭幕式上发言。和大家一样，我感到在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举行本届年会的闭幕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的关系是什么呢？刚才参观邓小平纪念馆时的一个信息对我颇有启发。邓小平同志自从 16 岁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即使 1949 年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就在重庆办公，也没有回过只有两、三小时车程的广安。原因是他家是地主出身，他怕回家乡会对土地改革有不利影响。这个细节生动地说明，邓小平对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当性，是非常坚定的。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在政治和法理的意义上是连续的。

但改革 30 年比改革前的 30 年的确有重大创新。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本回忆录很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 1990 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陈锦华回忆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夫人撒切尔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他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 8 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说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

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大家知道，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到重庆以后，把浦东经验带了过去，并有了新的发展。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家乡广安开会，我想我们就从重庆经验来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这是很合适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广安虽然行政上属于四川，但文化（包括方言）上属于“巴蜀文化”中的“巴”，即更接近重庆。邓小平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关心重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 2008 年 6 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 7000 亿，比 2002 年 1700 亿增加了 4 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 3%至 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 1.5%。又如，中央给西部 12 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 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 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 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正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 8 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在八小时之内把重庆所有县区都能够达到不容易，需要大量修路。“八小时重庆”建设，运用和发展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黄奇帆副市长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这个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 8 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 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可以很快回购它，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 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是 BT,但 3 年后重庆城投就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 7000 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黄奇帆副市长还

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它们的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精神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产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而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产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想还可以用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大家知道美国的鲍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他这种买坏账的方式，觉得非常不公平，是用老百姓的钱救那些华尔街的银行界的富人。但是，更重要的，索罗斯指出，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七千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 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八万四千亿美元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七千亿美元。当然鲍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是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 国有股占 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 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宝钢国有股占 75%。我们主流思想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鲍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救市方案时间是 2 年。但是，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 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是 1932 年 12 月份建立的，当时也说只有两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但实际 RFC 到 1955 年才停止存在。在 23 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这样渡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我们学院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中国就会亏。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了以后，原来私人股东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经济学的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产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 GDP 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 19 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上抬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 19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成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 年邓小平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分给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一个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 1980 年到现在已有近 30 年，最高在 2000 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国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谢谢大家！